

从《隆中对》的形成看信息在汉末 魏晋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杨 德 炳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客居荆州的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他阐明了一整套关于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方针和战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又称《草庐对》)。关于《隆中对》,古今学者早有许多精辟论述。本文试就《隆中对》的形成与信息的关系以及信息在汉末魏晋政治军事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隆中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汉末政治军事形势,主要是中原、江东、荆州、益州四个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指出曹操统一中原后,拥众百万,且“挟天子而令诸侯”^①,在政治上又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故暂且不宜与之争锋。据有江东的孙权,业已站稳脚跟,“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应视为抗衡曹操的同盟者。荆、益二州民殷国富,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而其主刘表、刘璋“闇弱”、“不能守”,正可取而代之,作为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基地。二是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方针与行动步骤。指出第一步先“跨有荆益”,建立根据地。第二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作好充分准备,以待时机。第三步是一旦时机成熟则兵分两路由荆、益出师中原以完成复兴汉室大业。以后事态的发展,诚如唐人裴度所云“泊乎三顾而许以驱驰,一言而定其机势,于是扶翼刘氏,缙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②。复兴汉室的最终目标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但建立霸业的目标是达到了。故总的看来,诸葛亮为刘备所绘制的这一政治蓝图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说《隆中对》是切实可行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比较正确地切合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历史上的孔明决非古今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位能知过去未来的“神人”,《隆中对》自然也不会是他头脑中天生的固有之物。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只能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隆中对》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正是诸葛亮先对当时全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后再经过他缜密分析和综合的产物。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个人的政治态度也并非毫无作用;相反,它给《隆中对》打下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那么,身居隆中,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为什么能对天下大事如此之熟悉?他是通过何种方式、什么渠道获得这些有关天下大事的信息的呢?

众所周知,诸葛亮并非什么真正的隐士,他在隆中过的也不是什么足不出户、耳不外闻的隐居生活。《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这段记载可以视作对诸葛亮隆中时期生活、学习、政治抱负和政治态度的全面概括。在日常生活中，他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经常与友人出外游学以增广见闻，切磋学问。在学习方法上，他不做死记硬背老死章句的书呆子，而是著重领会其精神实质。在政治抱负上，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刺史郡守老此终生，而是向往能向管仲、乐毅那样做一番大事业。在政治态度上，他劝说孟公威不必北归，表面说的理由是中原人才够多了，而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北归与他的政治态度相抵触。关于这一点裴松之早有评论。他认为诸葛亮不愿北归，并非怕“功业不就”，而是患“道之不行”。因为此时中原“权御已移，汉祚将倾”，而诸葛亮的壮志正在于“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已任，“即以复兴汉室为已任”^③。正是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抱负，有力地推动他去关心天下大事，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去收集有关这方面的种种信息，并经过精心分析和思考以制定出自己的济世之策来。

在诸葛亮所处的时代，人们交流、传递知识与信息的工具主要是依靠语言、文字和各种信号如烽燧、屯候、钲鼓、旗号等等。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文字全靠手抄，故种类和数量都大受限制，只有手抄的书籍、文书、书信等寥寥数种。而在电话没有发明之前，语言的交流更是只限于面对面交谈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接收知识信息的程度，就与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生活圈子的大小，接触面是否广泛，接触对象知识文化水平的高低亦即是否消息灵通人士等都有极其紧密的联系。因为交流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工具虽然只有上述三种，但交流传递知识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却是因人而异的。谁如能在以上诸条件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所拥有的信息渠道就会增多；反之，就会减少。如果我们把信息传输工具看成不变数，那么，信息传输渠道和信息传输量就是可变数。渠道愈多，传输的信息量就愈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的。下面就让我们对诸葛亮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作一些具体考察。

诸葛亮客居的荆州，不但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在汉末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战事甚少，政局平稳，中原士大夫纷纷前来避乱，史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从而使州治襄阳成为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和人才荟萃之地^④。大量海内俊杰之士的到来，无疑会带来许多有关全国形势的新信息。

诸葛亮有关心天下大事的愿望，襄阳地区又存在着丰富的信息来源，而沟通二者之间的媒介和渠道，除了他的直接观察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与亲友之间的频繁交往和联系。

本传称诸葛亮琅邪阳都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琅邪郡本为汉代文化教育高度发达地区之一，对于两汉经学具有重要影响，绵延四百年之久的“伏氏学”，其创始人伏胜虽出自济南，但自其四世孙伏孺于武帝时“客居东武，因家焉”之后，便在琅邪扎下根来^⑤。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累世经学》条曾盛称“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亦儒学之最长者也。”魏晋以降，琅邪郡之所以能产生象王氏、诸葛氏那样的名族，并非偶然，而是与该地区源远流长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分不开的。琅邪诸葛氏本是西汉以来的著姓，史籍所见诸葛亮父辈的官位虽不算显赫，但到诸葛亮这一辈，亮为蜀丞相，其兄瑾为吴大将军，族弟诞又名显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亦足以说明该族家学渊源，对子弟训教有方。史称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⑥，诸葛亮自然也不会例外。据考，诸葛亮离乡时已经十三、四岁，可以肯定此前他在家乡是早已受过良好教育的。

由于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加上诸葛玄与刘表的旧交，所以诸葛氏来到荆州后，不仅得到了刘表的礼遇和优待，而且深受当地大族的尊敬，并与他们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诸葛玄能与号称汉末“八俊”之一的刘表“有旧”，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自己必定也是一个名士。而年轻饱学的诸葛亮则不仅很快就置身于当地的名士行列，而且其名气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襄阳耆旧记》称：

（翻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

庞德公，襄阳人……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

黄承彦，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

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竟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

由于诸葛亮妻为黄承彦女，而黄妻与刘表后妇又均为蔡瑁之姊，这样诸葛亮就不仅与蔡瑁构成了亲戚关系（甥婿与妻舅），而且与刘表除了世交之外又增加了一层亲戚关系（姨侄婿与妻姨丈）。翻祺虽史载不详，但据《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及裴注所引司马彪《战略》、《博子》记载，有翻越者，南郡中卢大族，佐刘表平境内，是刘表的“大将”，官至竟陵太守。翻祺盖即越之同族，建安十三年后与翻越一道随曹军北上，并官至房陵太守^⑦。至于襄阳大姓庞氏，庞德公虽无意为官，但他的族人庞季也是刘表的最早支持者之一，曾与翻越一道单骑入襄阳城劝说“江夏贼”张虎、陈生投降刘表，后官至荆州治中^⑧。以上诸人中，刘表为荆州最高军政长官，蔡瑁为荆州第二号人物，翻越为刘表谋主，实为支持刘表政权的两大台柱。庞氏地位虽不能与蔡、翻相比，但也是刘表最早的支持和依靠者之一。诸葛氏既然与这些家族结成了姻亲关系，自然就免不了有所交往和联系。如与刘家的关系，虽然诸葛亮在政治上并不倒向刘表，但据亮本传称：“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说明诸葛亮与刘家还是经常有来往的。我们知道，建安十二年之前，诸葛亮尚未出仕，并非当地军政界人物，自然不可能直接拥有军政系统收集情报和信息和各种渠道。但由于他的亲戚皆为当地军政要人，因此，他完全可以通过与他们的交往，间接地获得大量有关全国和当地的大量的信息。

我们知道，诸葛亮兄弟三人，除弟诸葛均与他同住隆中外，还有一位“同产”兄诸葛瑾，汉末避乱江东，后为孙权长史，转中司马^⑨。再者诸葛氏除诸葛亮兄弟南迁外，其他族人仍留居原籍。上文提到的诸葛诞就是其“族弟”，还有一个诸葛璋，魏黄初年间官至谒者仆射，曾奉命致书诸葛亮陈说“天命人事”，亦当为诸葛亮族人^⑩。因此，诸葛亮亦可通过与他们的联系获取一些有关江东、中原情况的信息。

如果说与亲族的交往和联系是诸葛亮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与当地名士界的频繁交游则是他了解时局的另一重要途径。这些名士主要有：

庞德公，襄阳名士界首领，人物评论的权威人士，“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之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他的家简直就成了当地名士界经常聚会的场所。“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司马德操尝造公，值公度沔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来就我与公谈论’。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⑪崔州平，出自博陵崔氏”《诸葛亮传》注引《崔氏谱》曰：“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徐庶，字元直，颍川人，亮传及注引《魏略》称他“与诸葛亮特相善”。“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可见徐庶不仅与诸葛亮持相友善，而且还主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终于促成刘备的三顾茅庐之举。

孟公威，汝南人，名建。

石广元，颍川人，名韬。以上三人均为诸葛亮挚友，曾一起游学。

司马德操，颍川人，名徽，号水镜。亮传注引《襄阳记》称：“刘备访世事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可见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评论家。他既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说明对亮十分了解，二人交往甚深。

以上诸名士既有本土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政治文化素养，知识渊博，社会联系面很广，堪称消息灵通人士。他们之间经常相互造访，聚会，游学，不外乎是为了切磋学问、品评人物和议论天下大事。因此，诸葛亮在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不但可以获得大量有关时局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坦率地交流对时局的看法，这对于增广见闻，了解时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几十年后，诸葛亮在蜀中还对他的属下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②，可见他对这段往事是十分珍视的。

今天我们读《隆中对》，无不惊叹诸葛亮对天下事是如此之熟悉，对中原、江东、荆益二州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是如此之精辟。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诸葛亮出自汉代文化教学高度发展的琅邪郡，家学渊源，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二、家庭和社会关系使他具备了广泛吸收社会信息的优良条件；三、善于分析思考与集思广益。至于他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乃是一条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其它，则完全是由他忠于汉室的政治信念所使然。当时在荆州的其他名士如蒯越、韩嵩、傅巽等，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军政界中人物，获取信息的条件甚至比诸葛亮更为优越，对中原、江东、荆州形势的看法与诸葛亮也没有什么不同，如都认为曹操处于绝对优势，孙权业已站稳脚跟，刘备弱小，刘表无能等。但因他们与诸葛亮政治信念不同，故得出的结论也就与诸葛亮截然相反即倒向曹操。

以上我们具体地考察了信息在《隆中对》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诸葛亮是通过哪些方式和渠道获取这些信息的。下面让我们把眼光转向整个汉末魏晋时期，看看信息在这一时期政治、军事生活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看到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我们的祖先既不知道“信息论”为何物，甚至也不常用“信息”这个词，但他们的生活并不与信息脱节。古代的政治家为了治理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民情；古代的军事家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但要“知己知彼”，而且要掌握山川地形、气候变化等等情况；古代科学家靠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来完成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古代的商人（主要指大商人），十分重视对各地产销状况的了解；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强调“读万卷书”的同时，还讲究“行万里路”，通过游学、交往、考察、“不耻下问”来加深对社会情况的了解。这一切用现在的话来说，无非就是获取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不但建立过非常发达的信息传递系统，如邮传、烽燧、亭候、巡察、上计吏等等制度，而且由于“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我国在拥有信息传递手段方面长期处于先进地位，并对各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

其次，我们看到，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给我们留下了重视信息、善于收集和处理信息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众所周知，汉末魏晋是大族名士非常活跃的时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以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作后盾，而且还在于他们具备不同程度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些才能的获得，除了高度的文化素质外，还须具备广泛吸收社会信息的条件并善于利用它们。特别是对当时能量最大的所谓“智能之士”来说，由于风云突变的政治、军事斗争要求他们迅速作出抉择，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因此，能否掌握事态发展的有关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一时期几次著名的战争，也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在战争中起着重要

作用的有力证据。如官渡之战，在相持数月后，曹军由于严重缺粮和后方不稳，形势曾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许攸叛袁投曹，带来了袁绍军粮万余车全部屯于乌巢并毫无戒备的信息，建议奇袭乌巢，焚其军粮。曹操当机立断，亲率步骑偷袭乌巢成功，而袁绍得知曹操这一行动后，却不是先去援救乌巢，而是派大军攻打曹营。结果不但军粮被焚，而且派去攻打曹营的大将又投降了曹操，终于军心大乱，全军覆灭。又如赤壁之战，我们从诸葛亮、周瑜等人对曹军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孙刘联军对曹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一向足智多谋的曹操却由于骄傲轻敌而忽视了对联军情况信息的收集与分析，以致未能识破黄盖的诈降之计，终于在突如其来的火攻面前一败涂地。提起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人们往往把荆州的丢失归咎于关羽的“大意”，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就是吴将吕蒙用诡计搞掉了关羽沿江设置的“屯候”即情报传递系统，致使关羽无法援救江陵，从而丢失后方，进退失据，束手就擒。在淝水之战的开始阶段，晋军统帅谢石等慑于秦师表面上的强大，曾一度畏缩不前。后苻坚派被俘晋将朱序前来说降，而朱序却将秦军战线过长、内部不稳的致命弱点私下告诉了谢石等人，说：“秦若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这才促使谢石等人下定决心，而决战的结果，果然不出朱序所料^⑬。以上说明，决定战争胜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关键时刻一条关键信息的获得与否以及对其处理的适当与否，也确实具有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未失去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注释：

- ①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后文凡引亮传，不再加注。
- ② 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
- ③ 《诸葛亮传》裴注。
- ④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三国志》卷21《王粲传》。
- ⑤ 详见《后汉书》卷26《伏湛传》。
- ⑥ 《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 ⑦ 《三国志》卷40《刘封传》称：“房陵太守蒯祺为（孟）达所害”。
- ⑧ 详见《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水经注》卷28沔水注称宜城县太山建安三年崩，“县人恶之，以向侍中（按当作治中）寗季”。
- ⑨ 《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
- ⑩ 详见《诸葛亮传》注引《亮集》。
- ⑪ 俱见《襄阳耆旧记》。
- ⑫ 《三国志》卷39《董和传》。
- ⑬ 以上四个战例，请参《资治通鉴》卷63、65、68、105。